
后伊拉克时代与中国的内政外交

——普遍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冲突——

加加美光行

(KAGAMI Mitsuyuki, 爱知大学)

I

9.11事件后，冷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最大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第一，确立了以美国为核心霸权国家、以反恐为普遍正义的全球性安全阵线。第二，美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戏剧性地高涨起来。就像当时有人强调因为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的人在世界贸易中心工作，所以对世贸中心的攻击就是对全世界的攻击那样，在美国国民中普遍存在着这样的观点，因为美国社会自身就是世界的缩影，所以星条旗也可被看作是超越一国国界的全人类的普遍象征。

反恐的普遍主义和美国的爱国主义当初之所以看上去像蜜月般地结合在一起正是缘于这种想法。但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理论上与普遍主义相反，是单边主义性质的，因此与反恐的普遍主义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从最初就一直存在。

布什政权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在重操去年（2002年）9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的“先发制人”理论的同时，违背联合国主导的原则，在没有安理会支持和承认的情况下采取了单边霸权主义行动。这时，反恐的普遍主义和美国的爱国主义（单边主义）之间的紧密结合就开始出现了裂痕。这种国际政治的新局面也必定对亚太地区的地区安全、特别是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以下笔者将就此进行若干分析。

II

实际上，以标榜自由主义的美国为中心的国家与非自由主义倾向的发展中国家在如何看待9.11事件后形成的全球性反恐普遍主义的问题上“同床异梦”，有着不同的理解。

毫无疑问，自由主义国家将反恐的普遍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普遍正义性视为一体。这无疑与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中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¹他们认为冷战的结束使得自由主义取得全球性胜利变得可能，自由主义文明与非自由主义文明间的对立成为后冷战时代的主要矛盾。当然布什政权就一直持这个观点，将“先发制人”论正当化也引用了这个理论。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即使没有达到与自由主义敌对的地步，其政治体制与文化文明的背景仍包含浓厚的非自由主义因素，他们仅仅把恐怖主义看作是破坏国家统一和秩序的普遍性的罪恶，才参加国际反恐战线的。在他们眼里，反恐的普遍正义等于扩展自由主义的正义这

样的论点是不存在的。

换句话说，包含更多非自由主义因素的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国民国家的统一、保卫“国家主权”才加入国际反恐阵线，与之相比，美国和部分自由主义国家组成这个反恐阵线则是以即使限制“国家主权”也要甩开国家的整合（的限制）、将自由主义扩张到全球、取得最终胜利为目的的。在这里旨在维持国民国家的框架和否定这个框架的矢量朝着相反的方向作用着。

但是伊拉克战争及其后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和统治中，前面提到的布什政权标榜的反恐普遍主义和爱国主义（单边主义）之间的矛盾就凸现出来了。可以认为，第一，根植于美国反恐普遍主义深处的追求自由主义普遍化的态度导致了对非自由主义的伊拉克文化与文明的社会背景的无知和轻视，甚至引发了对（伊拉克）历史遗产的掠夺和破坏。第二，由于意识到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统治出现破绽并进而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原本与自由主义普遍化诉求相连的美国爱国主义（单边主义）的势头正在日趋减弱。第三，随着反恐普遍主义与美国爱国主义（单边主义）的蜜月出现裂痕，对美国主导的伊拉克占领统治进行批判、主张强调联合国的主导作用的意见正在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9.11事件后一度对美国主导的反恐阵线表示出积极参加姿态的中国和俄罗斯、中东国家、甚至法国一起强化了维护国民国家整合的框架、明确保护“国家主权”的立场。以阿南秘书长为首的要求恢复联合国主导权的主张也遥相呼应。

当然，这样的变化势必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安全，特别是影响中美关系以及与美国结盟的日本与中国的关系。

III

后冷战时代美国的独霸性的世界战略在理论上讲是以美国的压倒性军事优势为前提的，它否定了冷战时代中建立在威慑战略之上的势力均衡体系。而势力均衡体系中，维持国民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国际秩序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对威慑和势力均衡体系的否定也可以说必定导致对国民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国际秩序的否定。实际上，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TMD, NMD）就是建立在否定以威慑战略为基础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MAD,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之上的。但是对威慑战略的否定，特别是对中国来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中国的国际战略主张以大国间的势力均衡为（根本）条件的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的原则，同时也强调将小国的发言权作为维持秩序的必要条件，并且至少不否定威慑战略。因此，今后中美关系中最有可能的不安定因素就是在围绕否定还是肯定威慑与势力均衡体系这一战略上的分歧。中国今年（2003年）10月中旬成功发射了载人飞船，这不仅仅意味着在宇宙科学技术上的竞争，也是中国要向世界显示，面对美国的一极霸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普遍化战略，中国拥有充分的“威慑”能力。

同样，日本正朝着参与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并开始具体部署实施的方向迈进，但这和布什政权一样，是与维持传统的以国民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背道而驰的。日本政府的“导弹防御计划”、“反恐特别措施法”、“伊拉克支援特别措施法”等都是违背日本现行宪法

规定的“专守防卫”原则、肯定“集体安全”的行动，毫无疑问现在肯定“集体安全”的做法明显是为了迎合将自由主义扩展到全球的普遍主义构想的。可以说这样的动向很可能成为影响将来中日关系的不安定因素。

9.11 事件后国际政治的变化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国内政治。

特别是今年（2003年）春天开始执政的胡锦涛、温家宝政权，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作为执政目标。但是如果“民主化”在国内外与美国主张的自由主义普遍化要求结合在一起，会陷入更加威胁到中国国家统一的悖论中去。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实现可以清除党、行政、企业（党政企）三者（职能）不分这个腐败贪污根源的民主监督机制，可在当今的国际政治背景下要推行重要的“民主”（改革），只有采用渐进主义的方式。总之，如果中国所称的“民主”不是与自由主义“民主”相连的美国式的轻率的普遍主义（式的民主），而是在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前提下的单边主义“民主”的话，这样的民主包含什么样的内容、能否实现就成为问题的核心了。

1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Summer 1989).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刘星 译)